黄浦江边　兴庆湖畔
西迁北举　后世垂范
子女缅怀　薪火相传
祝我交大　辉煌长伟

史纪祥
2016年2月

JIAOTONG
UNIVERSITY

前 言

拓荒者的奋斗画卷

——读《从黄浦江边到兴庆湖畔》

贾箭鸣

西安交通大学即将迎来120周年纪念。建校120年和迁校60年的斑斓历史催生了一批颇有分量的作品，其中出自西迁人后代手笔，以追思父母先辈为主题的《从黄浦江边到兴庆湖畔》是很特别的一本，其文质朴而其情真挚，纪实性很强，在娓娓的叙述中，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拓荒者的奉献与奋斗画卷。由于我本人此前曾配合宫辉先生参与这本书的策划，也曾与编者周纲先生及史瑞琼女士等讨论征文和出版事项，故而在其编讫付梓前得以阅览全书。一册在手，颇觉厚重，先睹为快，幸何如之。我并不是编者，但这长长短短详略不一、风格各异的几十篇文章我读了两遍犹不忍释手。我从中读到了西迁人的胸襟、境界与情怀，读到了交通大学举校西迁的艰难与坚韧，也从中体会到西迁60年来的风起云涌，沧桑巨变。耳畔响起的，还有那些可敬的西迁人及其子女后代，对祖国、对学校、对家庭所寄予的深厚感情和对未来的深切呼唤。以我这样的年龄已经不易动感情了，但这本朴素的书稿却令我一遍遍眼眶湿

润。前不久我曾出版《交通大学西迁：使命、抉择与挑战》，尝试为西迁立一小传，虽然也倾注了感情，涉及不少人和事，但毕竟不是西迁亲历者和深入研究者，水平所限，写出来的东西不免挂一漏万，肤浅单薄。假使当时就能读到现在所征集到的这么多情热衷肠的好文章，从中受到启发和感染，我的那本小书也许就会写得更好些。

交通大学西迁在中国教育史上自有它的重要地位。一座问世于清末，生长于东南，久居繁华大上海的高等学府的西迁，说到底是人的西迁，而那些携家带口义无反顾踏上征途的西迁先辈们，又是巨擘领衔，英俊济跄，人才荟萃，极其不同寻常的。虽然关于交大西迁的话题已经讲了几十年，但其意义和内涵还正需要我们一步步去深入了解。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会益发深切地认识到，在20世纪50年代，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开启的交通大学西迁，不但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整工业建设布局、文化发展布局、高等学校布局的一项重大决策，更是新中国知识界开创未来的一次伟大行军。它不但作用突出，而且影响深远，不但是彪炳史册的事功，更凸显了大学精神的升华和人的成长。交通大学西迁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和西迁后不断得到新的跃升与发展，一言以蔽之：众志成城。西迁师生们精诚团结力能扛鼎的非凡作为，在这里是第一位的，也是决定性的。当年由彭康校长所率领的西迁队伍前赴后继铿锵而行，居功至伟，堪称楷模，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对于时代召唤作出了响亮的回答。

关于西迁精神，多年来有一个公认说法：“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细细想来，讲得是很中肯的。交通大学西迁史，就是那些对于国家民族怀有强烈责任感的先辈们在风风雨雨中迎难而上奋勇登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创造的一部崭新历史，是可歌可泣的西迁人群体——不但是当年的全体师生员工，也包括那些来自繁华都市、江南水乡的一个个家庭，于大西北黄土地深深地扎下根来，在今天已经难以想象的艰辛磨砺中，用青春、汗水乃至生命所铸就的伟大时代篇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读《从黄浦江边到兴庆湖畔》，我们不禁为西迁人这个了不起的群体所由衷激励，所深深感染。西迁先辈披

荆斩棘的身影与足迹，他们厚德载物的高远襟抱，在学问和事业上勇往直前、永不止步的人生态度，集中体现了交大优良传统，也与今天我们所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虽然延至今日，西迁老先生们大都已经遽归道山，悄然远去了，但典型犹在，他们的精神是不朽的，他们是一代代后继者永远引以为自豪的学习榜样。

正如古人所说，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从事档案文献和校史研究以来我的一个强烈印象是，1896年南洋启帆后，从老交大到西安交大，从新学的启蒙、工业教育的发轫到矢志创建世界一流大学，120年间学校始终涌动着一种不可阻遏的青春活力和勃勃生机，而这正是由志存高远、博雅卓荦、做人和做学问俱臻一流的交大人所缔造的。现在结合双甲子纪念，我们尤其对交大的先贤前辈——那些励精图治勇于拓荒的人们充满怀念敬仰之情，也渴望更多地认识和了解他们，从他们身上得到教育和启迪。《从黄浦江边到兴庆湖畔》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部生动可感的人物画廊。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仰望星空，一派璀璨。通过交大老先生子女们、孙辈们的这些细致入微的怀人纪事篇章，我们能够从中深切感知交大先辈的理想信念，清晰地看到他们的成长轨迹和建功立业身影，对他们的学识志趣、治学态度、做事风格和为人处世有一个较为立体的认识，这是很难得的。这本书的最大特色是亲人写文章，子女怀父母，情之所钟，涉笔家庭生活颇有精彩感人的地方，足以加深我们对于家国情怀的认识。

这本书的作者均系已故西迁老先生的后代，子女居多，也有孙辈。他们工作学习在不同领域，其中有些还是我所熟知的同事。依我一贯印象，交大子弟是别具风采饶有特色的，他们在西迁先辈的呵护教育下，在交大校园教书育人的熏陶中成长起来，还有不少在孩提懵懂之际亲身经历过西迁。从巨厦林立洋气十足的黄浦江边，到当年身处大建设热潮中的兴庆湖畔，化陌生之地为奋斗热土，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不知该有多少故事可讲啊。身为交大的孩子，他们的籍贯故里或是在江浙湖广

闽赣，也自然与上海有着某种天然联系，但他们却大都生长在祖国大西北，与三秦父老共同经历了风雨磨洗。他们平日所讲的一口交大普通话，有点上海余韵江南味儿，但也实在辨别不出属于何种口音，应是东西杂糅吧，也正好凸显了西迁所带来的融汇与交流。他们崇仰先辈所走的路，所以在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校友关系发展部联合发出本书征文通知后，给予积极回应，促成了这本书的按期出版。文如其人，在我感觉中，它们就好比“大树西迁”的一幅幅别致剪影，虽不敢说是篇篇珠玑，但佳作如林，值得推荐和分享。我自己付梓前已读了两遍，出版后还将一读再读。从这些流自肺腑直抒胸臆的文章中，我每每被那种至醇至真大爱存焉的丰沛情感以及桩桩件件的鲜活事例所深深触动。我不但从中读到了理解与感悟，也分明读出了赓续之志、传承之美。我想这实在是可以告慰于西迁先辈的。

写于2015年11月20日

目 录

战士、学者、教师的高尚品格——怀念敬爱的父亲彭康	001
交大人敬重仰赖的好“管家”——回忆我的父亲任梦林	011
经历多地交大的父亲严峻	019
相伴交大八十年——回忆父亲赵富鑫的一生	027
父亲沈尚贤二三事(外一篇)	041
一蓑烟雨任平生——回忆父亲周惠久	050
一生追求工业报国——怀念父亲吴之凤	057
爱国爱校 至死不渝——忆我的父亲吴有荣	074
读书教书写书——追忆父亲黄席椿	081
实事求是 大爱无疆——忆父亲胡汉章	089
学习父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回忆父亲王小同	100
“一面最鲜艳的旗帜”——忆我们最敬爱的父亲杨积应	115
父亲杨荣昭给我的印象和启迪	126
父母的平凡人生——回忆我们的母亲刘耀南、父亲汪人和	135
与母亲沈德贤、父亲陈国光一起西迁六十年	152

164 信仰的力量——回忆我的父亲吴励坚
174 毕生从教 无怨无悔——追忆父亲周建枢
201 辛勤耕耘 一生奉献——回忆父亲庄懋年
210 厚直兢业 慈父师表——缅怀父亲万家翔
222 人中骐骥——中国真空电器之父王季梅
233 师者风范——回忆我们的父亲蒋大宗
250 我平凡的父亲田锡生
259 坚守信仰的一生——怀念我们的父亲林星、母亲段淑琴
268 耕耘“交大”这片热土50载——回忆父亲程迺晋
284 勤勉一生 奉献一生——怀念我的父亲王则茂、母亲张惠琛
293 忆我的父亲何金茂、母亲赵洪美
308 三尺讲台 一生坚守——回忆我的父亲邵济煦
320 饮水思源 务实求真——父亲谢麟阁与交通大学的不解情缘
334 回忆我学才卓越英年早逝的父亲樊恒铎
349 父亲，儿女心中永远的丰碑
——写在父亲张祉祐诞辰九十周年之际
362 回首连着牵挂 记述带着责任——读父亲凌雨轩的书有感
372 承南洋求实传统 拓西交基础创新——忆我们的父亲潘耀鲁
388 从上海徐虹路到西安兴庆路——追忆我的父亲李金和
398 学之大者 严父慈心——追忆我的父亲刘子玉
407 一位卓尔不群，鹤发童心的学者——追忆我的父亲陈鸿彬
422 平凡的人生 崇高的追求——忆我的父亲齐涛
429 追寻逝去的时光——忆父亲邱昌容
443 身残志坚 自立自强——追忆我的父亲于轮元
454 “饮水思源”喷水池的设计者——忆我的父亲徐林

461 咸宁西路上的快乐时光——致所有的交大西迁人

从黄浦江边到兴庆湖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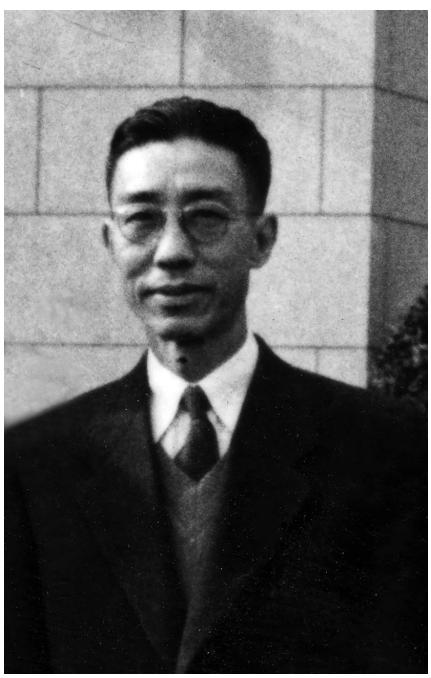
彭康(1901—1968),江西萍乡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文艺评论家、革命家、教育家。1919 年至 1927 年间留学日本。回国后,即加入新文学团体——创造社。1928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中央文委代理书记。参与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领导成员之一。1930 年 4 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狱中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1937 年 8 月经谈判斗争得以释放。之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宣传部长,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宣传部长兼组织部长,中原局宣传部长,华中局宣传部长,华中党校副校长,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华东局宣传部长,山东分局宣传部长等职。1952 年起任交通大学校长。1953 年兼任党委书记。1956 年率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曾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陕西省科协主席等职。为交通大学西迁及西安交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战士、学者、教师的高尚品格

——怀念敬爱的父亲彭康

彭 城

我诞生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安徽庐江，不久被送往老乡家寄养，接回部队便跟随子弟学校行军转移，正规念书后一直住校到1966年大学毕业，所以同父母共同生活的时间非常短暂。我是通过叔叔、阿姨的叙述和历史研究的史料了解他们的。尽管如此，父亲光辉的一生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彭康

1901年8月26日父亲出生在江西萍乡的一个破落家庭，爷爷有残疾，仅靠在萍乡中学做文牍和出租祖辈分下的土地为生。父亲从小劳动，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经祠堂小学进入萍乡中学，1918年秋留学日本，经补习语言和数理化后，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专科学校，并获取官费，后考入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1927年秋返回上海，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创造社党组成员、上海闸北区

委书记及中共中央文委代理书记。1930 年 4 月他不幸被捕。1937 年秋出狱，经长江局董必武同志审查后，进入华中抗日根据地，历任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中原局宣传部长、华中局宣传部长兼党校副校长及校党委书记、华中建设大学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局宣传部长兼秘书长和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全国解放后任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山东大学校长。1952 年率中央文化教育代表团赴苏联、东欧各国进行为期八个月的高等教育考察工作。同年任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7 年任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校长兼党委书记，1959 年 7 月之后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父亲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宝贵的。

他信仰明确，献身革命。他留学期间，接受国内五四运动的新

父亲（右四）在新四军军部盐城的合影

思想和“五卅”运动的影响，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积极进行“反对干涉中国”等社会活动，同时，认真钻研哲学。在学习与实际斗争中，逐步完成由唯心论向唯物论再到辩证唯物论的转化，由朴素的爱国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化，最终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1927 年秋，他完成全部学业却未等领取毕业文凭和学位证书，毅然同李初黎、冯乃超、朱镜我等人回国，加入创造社，使其转而宣传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理论。鲁迅对此给予很高评价，称创造社后期作家是“极坚实正确的人”，“已化为实践的革命者”。他积极参与组织进步文化团体以形成反对文化“围剿”的骨干力量。他是中国著作者协会的发起人和执行委员；是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参与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并在成立大会上与鲁迅、田汉等同为主要报告人；他还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主要组织者。

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奋笔疾书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于 1928 年主办《文化批判》，并先后在《创造月刊》《文艺批判》《流沙》《文化批判》《思想》和《新思潮》等进步刊物上以每月一篇的速度，连续发表《哲学底任务》《科学的人生观》《思维与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等文章，并汇编成《前奏曲》哲学论文集。在这些文章中，他向社会宣称“哲学的任务是变更世界”，指出人类应该改造社会，改造自己的历史。1929 年他在中国首次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与朱镜我、王学文合译《反杜林论》。

同时，他也积极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翻译《高尔基论》等著作，发表《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等文，随后出版《新文化底根本立场》文艺理论译著论文集。同时，他以上海群治大学和艺术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经常对

群众和学生发表演说报告，成为青年尊敬的朋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纤如当时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他说：“听彭康同志的讲课，奠定了我的人生道路，形成了我革命的世界观。”

父亲（左五）出访考察苏联

他坚定不屈，忠贞不贰。1930年4月，他（当时的名字叫彭子劼，公开身份是浦江中学校长）不幸被捕，被指控为“意图推翻国民政府，组织暴动，进行违反三民主义的宣传”等罪名，判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民权10年。根据党的指示，他在提篮桥监狱领导难友进行五天的罢饭罢水（绝食）斗争，抗议狱方对政治犯的非人待遇。之后又利用监狱环境的暂时改善，组织难友学习文化知识和马克思主义。为此，他受到单独关押“风波亭”等多次重罚。他在受刑时，坚贞不屈，宁可自己咬伤舌头，不吐一字，保护难友和组织。1931年顾顺章叛变，供出彭子劼名叫彭康，是共产党员，而他在法庭上拒不承认，租界法院无证据只得暂时作罢。1935年虽经大赦减刑仍不能出狱，国民党党部派员谈话，逼其自首被拒绝，遂将他关入苏州反省院。他在院方的刊物上发表《老子的哲学》《荀子的研究》等文，机智地从学术上借古人论述唯物主义的正确性。1936年因被告密为“不接受改造者”而被院方禁闭三个月。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138名政

治犯公推以他为首的四名难友代表与反省院院方经过13天艰苦的谈判斗争，履行“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的手续后，获得无条件释放。所以，经中央认可的华东局1954年的审查结论称：“彭康同志被捕后是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的”。从29岁到36岁，漫长的7年5个月的监狱生活，造成新婚妻子离散，刚出生的儿子夭折，但丝毫没有动摇过他的革命意志。

他淡泊名利，一心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刘顺元叔叔在南京同我谈到父亲时说：“彭康同志先为安徽省工委书记，我是委员、组织部长，后来建立淮南津浦路西省委时我任书记，他又任组织部长了，因为我先去该地区工作，情况熟悉。华中的干部中流传一句话，叫做‘远学老庄，近学彭康’（老庄指中国古代著名的道德学家老子、庄子）。据说，这是李一氓同志先提出来的。”我查了父亲简历，确实如此，他任安徽省工委书记时，负责领导安徽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党的工作，而在路西省委却还兼任中心区县委书记；又如，1945年12月组建华东局，尽管他已被任命为宣传部长，但因为副校长张劲夫同志已先期去山东，所以他仍然留在淮阴华中建设大学，主持教学并经常亲自授课，直至次年3月率数百名师生北上，自己才赴任；又如，1948年他任华东局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调往渤海区党委兼任副书记，因为书记张晔叔叔是先于他在当地工作的山东本地干部。2001年7月2日，夏征农叔叔在上海对我也谈到类似“远学老庄，近学彭康”的提法，并说：“根据彭康同志的革命资历、理论水平、工作能力和为人品德，同志们都认为他应该担任山东分局副书记，但他却愉快而勤恳地做着宣传部长的工作。”

他对每次调动都愉快接受，从不讲价钱提条件，一心为工作。再如交大西迁，从生活条件上他选择了艰苦；从工作环境上他选择了生疏；在交大原地发展和异地新建上他服从中央选择了开拓。

因而在1957年校内外复杂的局面中他团结党委一班人又依靠教授们，集思广益提出“一校两地、统一领导”的方案，在边建设、边搬迁、边招生、边重组（上海、西安各调整合并多所学校）的情况下，保证教学质量。1959年春，交大的两个部分均获得国家认可的重点地位，并于当年9月分设为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均成为国家重点大学，不仅使交大获得空前的历史性的大发展，也为国家高等学校的合理布局作出贡献。历史使他成为西安交大的奠基人和开发大西北的先驱者。

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这是他的一贯作风。譬如对待干部问题。华中地区党政军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大多都在父亲主持的华中党校学习过。华中党校自第三期起，负责干部的整风审干工作。他坚持教育为主，重视学习，启发觉悟，从实际出发处理历史问题，不伤害同志，颇受大家的信赖，因而党校的经验被作为典范加以推广并上报党中央。他主持起草的华中局宣传部《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讨论中央决议的通知》一文被列入整风学习指定文件。他担任军直属队整风学习检查总委员会的整风文件研究总指导员，曾就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加强党性问题多次作专题报告。他正确执行党中央的决策，亲自调查研究，为纠正部分地区发生的肃反扩大化的倾向作出自己的努力。整风后期，他执笔以张云逸、曾山、赖传珠、彭康四人的名义致信中央，请陈毅同志返回华中工作。在交通大学工作期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也尽其所能保护干部，至今交大一些同志谈到这些情况时，经常还是热泪盈眶。又譬如对待理论问题，他明确反对“劳动代替课堂教学”、“生产代替科学研究”、“停课闹革命”等破坏教学规律和打乱教学秩序的做法，明确指出“语录进课堂”是不对的。他始终强调“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学生是接受间接知识的，教学不一定要从实践开始，应

先传授理论，然后再到实践中去验证、运用”。试想，在当时的那种“左”的形势下敢于提出这些思想并付诸实践，需要多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

他积极探索、勇于实践。1928 年，他所翻译的列宁的《托尔斯泰》和《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及冯雪峰翻译的另外两篇文章，共四篇经典著作“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注：参见《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122－123 页）。同年底，他参与发起的“中国著作者协会”的宣言中就明确指出：著作者“是出卖知识而生活”，“是知识的劳动者”。他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一年，于 1941 年五六月间，同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钱俊瑞共同主持鲁艺华中分院的业务干部、文艺系及苏北诗歌协会的同志们一起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1940 年 3 月，他到现场指导华中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政府的成立。1945 年他任华中建设大学校长时，倡导“上课与工作交替”、“学习自由”的教学方法成效明显，被《密勒氏评论》的美国记者爱德华·罗尔波称为“世界上最新式的大学”，向世界报道。他主持交通大学，在全国高校率先于 1954 年成立一年级办公室（后来演变成基础课教学部），1955 年成立教师科，负责教师的管理和培训工作。20 世纪 60 年代头几年中，他组织诸如毕业生质量及适应性、专业设置、解放前后毕业生质量对比、师资培养、知识分子政策等十多项调查，在此基础上，于 1965 年提出“因材施教、拔尖培养”、“教师挂牌、学生自选”，学分学年制度结合等这些现在已被广泛采用而当时还鲜有人谈起的多项改革方案，努力探究高等教育的办学规律和领导工作规律，他的哲学思想贯穿于教育思想之中和领导教育工作的全过程，始终显现着他的探索与开拓精神。

确实，我对父亲的回忆，就他革命一生而言，真正只是点滴。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的遭遇是悲惨的。一是因为他在1929年、1930年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文化支部书记和中央文委代理书记，可能会知道一些江青、康生的情况；二是20世纪40年代，他在华中党校抵制了所谓的“抢救运动”；三是在山东分局时期，分局宣传部收到过一封揭发康生夫人曹轶欧的匿名信，康生为此毫无理由地忌恨彭康。康生在1958年视察交大时就说过挑拨的话，把“一贯右倾”的帽子扣到彭康头上。“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曾三次在公开场合诬陷彭康是叛徒，声称“怎么斗都可以”。终于使父亲遭受的迫害不断升级，1968年3月28日早晨在游斗殴打中去世。

对父亲的平反决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作出的，因而并不彻底。当时的中组部对陕西省委和西安交大党委关于彭康平反问题的请示答复称：追悼会只能在校园内举行，平反的消息不得在《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上登载。受此影响，对他的事业、成

父亲与青年教师谈心交流

就、工作、品德、气节的宣传一直是极少的。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导始终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他作为战士、学者、教师的高尚品格与革命情操也将永远活在爱戴他的人们心中！

彭城，彭康先生之子。

从黄浦江边到兴庆湖畔

任梦林(1905—1991),山东广饶人。1939 年参加革命。1952 年调入交通大学工作,历任总务长、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迁校时系最早赴西安选定校址的人员之一,并任迁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迁校工作。1959 年起历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为学校的后勤管理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82 年离休。

交大人敬重仰赖的好“管家”

——回忆我的父亲任梦林

任惠芳

学校总务管理，是指学校为保证教学和科研工作所需的物质和生活条件而实施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这项工作的基本职能是，根据国家制定的有关政策法令，在学校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条件下，更好地为师生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建立学校正常秩序，形成良好的校风和传统，以保证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

总务管理的定义听起来很平凡，然而我的父亲任梦林就是为这区区几十个字，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地贡献了毕生。

父亲任梦林

作为任梦林的女儿，我对他生前的工作并不是很了解。父亲生前从来不在家里谈及单位里的工作，对他实干寡言的风格，我们兄妹都习以为常了。后来我通过历史资料的检索才得知，父亲对交通大学的西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位于兴庆湖畔的交通大学新校园的征地、建设和搬迁，当时都是由我父亲负责完成的。